

□ 李 新

向市场经济过渡：俄罗斯与中国

过渡经济就其实质而言是经济发展的一种特殊状态,是社会从一个历史阶段向另一个历史阶段过渡时期的经济,是社会的“中间”状态、转折和改革的时代。过渡经济的一般规律在不同的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形式,甚至对过渡经济的专门研究也不能给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模式。过渡经济一方面反映着历史发展的自然进程;另一方面,应该有意识地制定社会改革纲领,对过渡进程给予一定的调节,确定过渡的目标,使其沿着某个方向发展,是改革性过渡。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在俄国开始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国也通过类似的纲领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90年代初掀起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浪潮,这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中国从70年代末就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转向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始了旨在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市场趋向的经济改革,并于90年代初加快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

一、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成效与社会成本分析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灵活的价格、私有产权和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根据这一认识,要达到市场有效的运行,必须具备几个前提条件,即经济自由、私有产权、竞争、法制市场制度、硬的预算约束、可以预见的国家政策。所以,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J. 萨克斯主张,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主要内容如下:

(1)市场自由化。经济自由化就是取消对价格的控制,并使之根据供求关系能自由波动,取消国际贸易障碍,使企业能自由进行进出口业务,取消对创办新公司的限制和扩大经营活动范围。(2)产权私有化。私人所有制是有效的市场经济的基础。私有化包括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国民经济中私有成份的发展两个方面。(3)经济稳定化。宏观经济的稳定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先决条件。其主要政策内容就是放弃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实行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4)制度化。制度化的首要内容就是法制化,确认私有产权不可侵犯,完善法律制度,重新确定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改革税收制度、预算制度、货币管理制度和银行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基本上都采纳了J. 萨克斯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案。这一方案所要建立的经济制度就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以资产阶级性质的企业家阶层为其依靠的主要力量,通过价格自由、货币自由等一系列自由化政策为以企业家为代表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创造自由的经营环境,通过国家调节和社会稳定,逐步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融为一体,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

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过渡已坚持了5年的时间,预期目标虽然未能实现,但终究不能否认,如今俄罗斯人所生活的社会已经根本上不同于改革前的社会了,在这段时间里俄罗斯经济发

生了许多实质性的变化。国家所有制垄断被打破,虽然充满了矛盾,但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局面正在形成。私有化一直是俄罗斯经济改革政策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经济自由化的核心,其主要特点是它的进展速度比任何过渡经济国家都要快。在仅仅两年多的时间里(1992—1994年上半年),作为小私有化对象的80%的中小企业转移到了私人所有者的手中。从所有制结构来看,到1995年8月,私有成份即私有化企业的数量第一次超过国有经济成份,达到50.5%,1996年达60%,其产值占GDP总额的70%。打破了行政命令管理和分配的机制和方式。市场经济基础正在形成,特别是金融、银行业发展较快。虽然主要是依靠进口商品,但是达到了一定的消费市场均衡。新一代企业家阶层开始出现并扩大,且日益采取市场行为模式。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服务业在GDP中的比例稳步提高,从1992年的33%上升到1995年的53%。经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转机。

俄罗斯经济转轨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表现出了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大危机的迹象。工业生产以及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大幅度减少,通货膨胀急剧上升,社会劳动生产率严重下降,失业剧增,人民生活水平一落千丈。俄罗斯经济的“休克疗法”导致国家许多经济部门的萎缩,俄罗斯经济处于红色警戒线上。轻工业下降了62%;GDP下降35%多,超过红色警戒线10—20%;食品消费依赖进口的程度50%;超过红色警戒线15—20%;用于科学研究的拨款占GDP的0.32%,低于警戒线6倍多;本国工业在国内市场上的地位受到外国公司的侵蚀,使俄罗斯经济自给水平下降。

工业化实力受到严重削弱。1990—1995年期间,俄罗斯工业生产下降了54.4%,1994年GDP的下降越过了55%的界限,1996年又下降了5%。1995年投资规模只有1990年的27.8%。

支付危机困扰企业。1992年价格自由化以后,企业的相互支付问题成了核心问题。拖欠的商业贷款在改革年代平均达到GDP的7—8%。1996年达到GDP的25%。

通货膨胀严重。1992年1月俄罗斯期放开价格以后,1个月内物价暴涨了245%,连续5年每年的物价上涨速度都超过200%。1990年12月到1995年5月物价指数上升了3470倍。

国内投资严重不足,大量资本外流。1992—1994年3年的时间,按可比价格计算,国家拨款投资下降了78%,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面临着崩溃。改革前3年各种渠道的投资只占贷款总额的4.5%,95—97%的信贷资金都涌向了短期货币市场。1995年的投资只相当于1990年的1/4。与此同时,大量资本流向了国外,每年有近150—200亿美元落户外国银行。1995年初俄罗斯国外资产不低于500亿美元。

科学技术实力严重下降。由于经济危机和强劲的通货膨胀,科研资金急剧减少,1993—1994年的科研资金只占GDP的0.5%。科学工作者的物质生活水平严重下降。1991—1994年,物价上涨达到2000多倍,而科研部门的平均工资只提高了260倍,这使得科研人员大量流失。科学工作者1990—1992年3年几乎减少了1/3。大量的专家学者弃学经商或移居国外。

俄罗斯经济转轨付出了沉重的社会代价。居民实际收入一落千丈,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拉大,衡量社会两极分化的基尼系数从1991年的0.260扩大到1994年的0.409。失业人数急剧增加。从1992年开始,失业人数每年以100万人的速度递增。社会治安每况愈下。

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

与俄罗斯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历经18年的改革,传统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受到非常

强烈的冲击,经济增长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已初步形成,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是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

国民经济快速增长。自1978年末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迅速增强,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经济实力迅速增强。首先是国民经济总量迅速扩大。1995年GDP现价人民币达57277.3亿元,按世界银行方法折算,在世界排名榜上可能位居8—9位,按可比价格计算,提前5年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国家外汇储备到1996年11月12日突破1000亿美元,达到1004.5亿美元,居世界前列。建立了比较雄厚的、先进的物质技术基础。非国有经济发展迅速,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经济效率有所提高,经济结构得到改善,对外贸易迅速增长,成为世界第10大贸易国,是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投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扩大,中国经济体制的格局和运行机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①以公有制为主体,全民、集体、私营、个体、外资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共同发展的格局已逐渐形成。原有经济体制中脱离生产力水平、结构单一的所有制结构被打破,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和私营、个体经济得到迅速发展。1996年非国有经济比重占到68%。②根据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正在得到转换,并逐步走向市场。为推动生产要素合理组合,组建了一批新型的企业集团,对部分中小型国有企业实行“租、改、卖”。为了探索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大批企业进行了各种形式的股份制改革。③以市场决定价格为主,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商品市场体系已初步形成。现在大部分商品价格已经放开,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土地市场等要素市场,正在迅速地发展。④宏观经济调控制度,已开始由直接行政控制为主,向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进行间接调控为主转变。指令性计划占全部工业生产产值的比重现在只有7%。与此同时,财政、货币政策作用增大。⑤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分配格局正在出现,新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形成。⑥开放成为推动国内改革和发展的巨大动力,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沿边开放城市和地区——内地的多层次、全方位、多形式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在外贸体制方面,中国将按照国际惯例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来管理进出口,加速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

三、中国与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比较

在共产党领导时期,俄罗斯和中国的经济非常相似。1989年以前,前苏联的改革进展非常缓慢且以失败而告终,导致了社会主义的瓦解,并将严重的政治动荡和经济衰退延续到了俄罗斯的改革进程之中。俄罗斯经济改革没有带来期待的经济奇迹,相反,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指标却急剧下降。而中国的经济改革是长期的,持续的。不管西方某些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咒骂并预示其死亡,然而社会主义制度却在中国牢牢地站稳了脚跟,社会主义大厦没有象东欧和前苏联那样倾覆。此外,中国对旧的经济体制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改革,逐渐成功地实现了市场机制的转变,开拓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崭新发展道路,并带来了高速的经济增长,无疑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重要的一点是,必须理解中国和东欧国家进行改革的背景和实质。在俄罗斯,前苏联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社会选择是决定经济政策方面的外部因素,共产党退出执政舞台,使俄罗斯已经没有什么机会再搞市场社会主义。所以,带有毁坏成份的制度变革已成为不可避免。而在中国,人民群众即使在1989年也没有做出放弃社会主义的选择。所以,中国不存在俄罗斯的上述破坏性因素。社会主义政府能够正确处理经济改革部门之间的关系,并在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进行有效的管理。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的制度改革之路,而是坚持并完善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国家调控。这与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

中国 80 年代末的经济已是分权的、开放的和竞争的,在中国分权制获得广泛的发展。经济的地方分权制度使政府进行局部试验,逐渐发展地区间的竞争,而没有一下子触动整个命令体制。特别是设立经济特区,先于全国全面的经济改革,为全国范围的经济改革铺平了道路。改革发展既没有破坏原有的政治基础,也没有破坏经济基础。中国的改革是试验性的,局部的,是在探索中前进的,这与其说是政治选择的结果,不如说是中国改革初始条件所决定的。而俄罗斯本也可以避免极端措施,如放开物价,但是,高度的地区专业化协作妨碍了这种作法,由于这种专业化而形成的一系列城市专门为一个企业服务。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急于求成,没有实行试点工作就全面推开了激进的改革。

中国经济结构受到国家强有力的影响,经济改革的特点就是加强宏观经济调控,避免了贸易迅速自由化带来的严重问题。中国选择了经济发展的“追赶”模式,国家在社会经济改革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这是中国改革的主要成份。相反,俄罗斯开始进行制度改革时,经济已经是高度工业化的了,贸易流向严重扭曲,故其改革的首要问题是稳定、结构改革和改变贸易流向。

俄罗斯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要比中国高得多。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中国与俄罗斯的重要区别在于它们的发展水平。中国是一个农业国,12 亿人口中有 9 亿生活在农村,因而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的土地改革和地方市场的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来说都特别重要。3/4 以上人口集中在非国有经济的农业,这样,城市工人享受广泛的社会保障,农民却与此无缘,从而加快了农业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大规模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吸纳了大量的闲散农业劳动力,从而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转变,使得中央计划体制、国有企业陷入困境时,就在体制外得到补偿。相反,俄罗斯是高度工业化和都市化社会,不足 1/4 的人口完全或部分地从事农业,俄罗斯 3/4 以上人口是城市居民,93% 的劳动力就业于国有企业。社会保障制度几乎覆盖所有居民,从而使职工的切身利益与其就业岗位有着紧密联系,减少了工作流动机会。

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在利用外资的方法上有着极大的区别。80 年代末主要是华侨,每年向中国投入资金 200—250 亿美元(主要是直接投资)。1996 年中国利用外资近 400 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中国的华侨不仅带来了资金,也带来了与市场经济打交道的先进经验。这种优势是俄罗斯所没有的。

中国和俄罗斯进行改革时公司治理的方式具有原则性的区别。在中国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国家虽然不再干预企业的具体经营活动,巨大项目的投资由国家来实现,私有成份的发展主要是通过新建公司。俄罗斯的改革削弱了公司治理的意义,不注意公司的改造,而将重点放在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上,其主要思想就是破坏公有制,造就“现实”的私人所有者。私有化方案几乎没有涉及到微观经济基础。例如,俄罗斯自发性私有化占主导地位,所有制形式变更之后,企业行为几乎没有发生变化,这种改革的结果就是从理论上预期成功的大型国有工业企业改造恰恰是不成功的。某些没有效率的企业不得不关闭或转变。中国的企业承担着各种社会职能,给本企业职工提供住房、免费医疗等,所以失业常具隐蔽性。至于农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管理的私有化,但不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的,农业市场的具体运作是自由的,但仍受到国家的宏观调控。

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表明,经济改革过程中必须加强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否则市场的自

我调节将使社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并丧失提高经济绩效的信心。制订经济改革和发展战略必须考虑到本国的特殊性,从而保证改革有机地、稳步地发展和深入。中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人口压力大等,使中国的改革采取了一系列十分谨慎的改革措施,从而避免了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剧烈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稳定,保证了改革的稳步前进。

四、结论

(一)政治稳定因素是影响经济改革的重要非经济因素。对俄罗斯经济改革来说,其后果最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就是前苏联的突然解体。这不仅是本国人民不可愈合的政治和精神创伤,前苏联的解体就其破坏作用来讲,严重影响了俄罗斯和前苏联其他共和国的经济。前苏联解体导致俄罗斯产品许多传统销售市场的丧失,供货人之间早就相互适应的几十年形成的合作联系的中断,商品、知识、资本和劳动力由于突然出现的国界而不能自由流动。再一个对俄罗斯经济改革全过程具有严重影响的政治因素就是国家中央政权软弱无力,几乎陷于瘫痪状态。三个权力机构的明争暗斗,社会政治不稳定,全社会的不安定感、不可靠感,严重影响着俄罗斯经济改革的进程和前景。

(二)经济稳定因素与宏观经济调控是经济改革顺利进行的保证。具有特殊意义的是社会稳定问题。这些问题的经济含义就是居民的收入,收入水平差距及其形成和再分配机制。社会稳定是个很敏感的话题,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政治家注意的焦点。向市场经济过渡,极为重要的内容就是建立起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并建立发展完善的市场体系。在这个构建过程中,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很重要。市场并非万能,市场调节是滞后的,并伴有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因此必须有国家或政府的干预。

(三)本国国情是经济改革和发展战略的出发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是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水平很低,工业化和社会化程度不高,经济结构不合理,人民生活水平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已有 30 多年的历史,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在意识形态上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较大;习惯于计划经济工作的各级经济管理干部对市场经济的适应有一个过程。因此,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只能采取渐进方式向市场经济过渡,并且这种过渡方式受到了实践的检验并证明是正确的。

前苏联解体之后,叶利钦推行全盘西化政策,恢复私有制,采用西方“休克疗法”建议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接收外来经验,不是简单地照搬和借用,而是将其根植于本国实践的土壤,必须对国外经济改革的实践经验进行选择,并考虑到它们同本国深厚的传统和民族意识的相容性。因此,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式问题上,无论是中国机械地搬用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还是俄罗斯机械地采用中国的经验,或者盲目模仿西方自由模式都是不可取的。1991 年年底俄罗斯政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制定经济改革战略时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简单地选择新自由货币主义作为其进行经济改革的理论指导。要成功地实现结构改革,首先应当考虑到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历史等因素,找出制约因素和促进因素,将改革引向深入

在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下,正象 J. 科尔纳所指出的,国家和企业之间存在的父爱主义关系使得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不负责任,不讲究效率,丧失劳动动机和积极性,即使能够迅速地打破或改变旧的经济体制所固有的这种行为方式和准则,人们也很难适应这种变化了的社会经济环境。脱离父爱主义关系,达到自由竞争、有效经营、风险决策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前苏联经济是世界上生产合作化与专业化水平很高的国家。前苏联的解体导致这种发达的合作联系的崩溃,许多企业由于物质技术供应集中调拨体制的解散而陷入了市场混乱的泥潭。计划经济条件下存在着高度的垄断和生产的专业化与集中,排斥竞争。1992年物价放开后由于需求限制和俄罗斯企业之间脆弱的竞争,导致物价的循环上涨:一个部门价格的上涨自然引起另一部门成本的提高,产品价格相应上升。垄断性企业提高价格的同时降低了产量。国家垄断价格变成了部门和企业垄断价格。前苏联居民收入普遍不高,但医疗、教育、交通等服务基本上是免费的,生活环境优越。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中社会保障被取消,大量专家外流,大批的人才纷纷离开物质生产领域,下海经商。

前苏联时期采取的基本上是单一的国家所有制,有些行业国家所有制占到100%。盖达尔政府高估了私有制的作用。所以改革至今仍与私有化的速度和规模直接相联。私有制在俄国的发展本来就比较晚并被十月革命所打断。70多年的公有制虽然没有使人们的意识与私有制隔离开来,但也不认为私有制就是一切灾难的灵丹妙药,因而人民对私有化并不欢迎。俄政府并未充分考虑这一点,而强制推行私有化,结果人们对私有化证券无所适从,土地私有化遇到了抵制。迅速的经济自由化不仅没有达到稳定经济的目标,反而使经济更加混乱和动荡不定,使俄罗斯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犯罪性质。

(四)关于市场经济模式。根据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国选择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俄罗斯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由美国学者J. 萨克斯以货币主义理论为基础设计的改革方案,追求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这两种不同的选择,反映了两国经济体制改革不同的指导思想,不同的改革性质。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通过改革吸取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市场经济),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消除一切阻碍社会经济发展和因素和弊端。所以,改革应视为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是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理论指导的。而俄罗斯则是在前苏联共产党地位被取缔和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下进行改革的,从而使社会主义转向了与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趋同的制度。改革的性质与目标模式的不同,使一些重要的改革政策也就有很大的区别,进而取得的成效也就不同。

参考文献:

1. Сакс Дж., Рыноч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Россия. М1994
2. Росс Дж., Почему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реформа потеряла крах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и России, а в Китае оказалась успешной? /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Пол1, 1992.
3. Вузгалин А., Переход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М1994
4. Переход к рынку в КНР: наследие прошлого и прорыв в будущее. М1994.
5. 陆南泉:《独联体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研究》北京, 1995
6.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报告:《市场化改革整体推进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北京, 1995
7. 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向市场过渡》北京, 1996
8. 李新:《过渡经济比较研究:理论与实践》上海, 1997.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单位邮编为200433)